

【动态与综述】

202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耕与突破

——以复印报刊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刘 江

【摘 要】2022年,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内容丰富且各具特点。政治史领域持续关注国家治理、政策制度等重大论题,思想史研究在注重精英人物和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也聚焦于民众和基层,经济史成果则从财政预算、关税调整、传统经济转型等方面呈现多点开花的趋势。其他如环境史、医疗史、性别史、食品史等社会史领域的成果也鲜活生动。总体而言,该年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关注学科交叉、重视中外文史料、建设本土话语理论,以及在细致考辨基础上追求宏大叙事和价值取向的特点。

【关键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23.7.130~142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每年都有大批优秀研究成果问世,对这些成果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动相关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整理2022年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和索引所收录的近1100篇论文,剖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此勾勒出2022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面貌,总结这一领域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为推进今后的相关研究做参考。

一、政治史研究持续推进

2022年,政治史研究继续重视与国家治理、权力机构、政策制度等相关的重大议题,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走势提供了贯通性的研究理路。该年度学界在以下方面对政治史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创见。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是学界努力回应

现实关切的课题,其主要研究思路是从学理角度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阐释。李怀印阐述了清朝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重均衡态”的形成、颠覆、重建和再度消失的过程,认为三重均衡态在推动清朝康熙乾三朝走向盛世、成就“同光中兴”及维持18世纪中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不过却使清代中国落入三重均衡陷阱,失去在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军事能力方面不断提升的动力,阻碍了清朝国家能力提升,导致清季十年国家近代转型失败,最终导致清朝覆亡。^①翁有为、王力从晚清民初国家权力和地方势力的消长博弈入手,讨论了近代以来的权力更替和国家中心力量的重塑的演进历程,进而指出中共作为国家中心力量的形成和确立是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②徐勇对近代中日两国军阀政治现象及其政治文化做了比较研究,指出中日两国的军人政治态势与军阀现象实质上具

有较大差异,而且终结方式也完全不同。^③马建标认为20世纪初中国军阀政治兴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国际环境,要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单靠欧美列强的外交支持以及文人政客的政治努力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新型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④任锋、马猛猛运用概念史的方法探究了“中央集权”概念最初引入中国时的历史情境及其意涵演化过程,指出此概念引入和广泛传播时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思维范式和习惯用法,不仅形塑了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央集权的一般性认知,并且从更深层次影响了其对现代中国政治文明传统、政体和内外关系等基础性问题的争论和重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转型期政治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逻辑,以及推进对中国近百年政治学话语体系和思想基础的深层理解。^⑤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背后是利益之争,利益争斗又牵涉复杂的人事纠葛。透过权力的分配、博弈和互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全局。军机处的创设及职权的形成、完善、变化和内部人事争夺等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最近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刘文华充分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材料,从垂帘听政时期事权下降的程度、军机处职权扩张的范围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慈禧垂帘听政时军机处在文书处理、官员任用等方面职权的扩张和变化,进而指出军机处职权的扩张影响了晚清50年的政局。^⑥杨猛将宣统二年弹劾军机风潮置于清廷中枢改制的进程中,考察了朝野各派势力在弹劾风潮前后围绕中枢改制展开的政治博弈与互动,以及该事件对清廷立宪和宣统政局的影响。^⑦

政治事件曾是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研究范畴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势头虽有所减弱,但对重要事件的深化、细化和重新解读仍有必要,这更有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同时,政治事件史的研究范围早已突破了所谓“八大事件”,而是转向全方位、多元化研究的趋向。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近年来的研究正在不

断加以充实。欧阳哲生利用近年翻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中披露的英、法文献材料,勾勒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从洗劫到焚烧的史实、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观测和预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情等以往学人较少关注的历史细节,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真正攻入清朝的心脏,是中国近代史更具实质意义的历史转折点。^⑧尚小明对庚子年粤督李鸿章的“不奉诏”事件进行了考辨,认为李鸿章提出的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所发的“宣战”诏书,而是针对清廷“集义民御外侮”的谕旨,从而看出李鸿章对于东南互保最初并不积极,而是盛宣怀在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之间积极联络沟通的结果。^⑨李长莉结合资料辨识并解读了宫崎滔天家藏的两件革命党人题签字幅,揭示了1914年孙中山与黄兴分裂时革命党人反应方面的新史实和新意义。作者认为题词内容反映了革命党人群体或多数人对黄兴的尊重与友情,对其与孙中山分裂并出走抱以谅解与包容,以及革命党核心骨干群体在孙、黄二位领袖的示范和努力下,共同维护了革命党的团结局面。^⑩侯中军针对学界存在争论的孙中山蒙难事件这一课题提出了新看法,认为无论是“绑架说”还是“自投说”均无法合理解释涉案双方的材料记载,而合理的解释是孙中山为了推动革命宣传和改变处于困局中的反清革命,主动策划了自己被清使馆囚禁事件,因此是一次有预谋的自投。^⑪

革命史和改革史是政治史研究领域的两大主题,相比较而言,革命史研究渐趋弱化,政治改革史则仍有新的成果问世,使近代史研究更加丰满。郑大华指出,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有着重大分歧,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二是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认识不同,分歧的根源是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建立统一的

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成为两派的基本共识。^⑫张仲民在利用报刊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梳理了民国初年朝野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民国立君和总统世袭三种国体建构方式的争论情况,分析了袁世凯最终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原因。^⑬赵建民指出,1908年国会请愿仅有各省签名上书而无研究国会开设办法,仅为空言请愿,很难打动清廷,因此预备立宪公会主导发起创办国会研究所,研究国会组织及开设方法,从法理上支持各省的国会请愿,虽最终遭到清廷否定,但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⑭

法律史是法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近年来很多历史学者进入该领域,在2022年也发表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新气象。杨瑞论述了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的过程,指出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受欧洲比较学派影响,开创了东洋文化视域下“法系别”比较法学派,并被章宗祥、曹汝霖等留日学生引入汉语世界,成为沈家本借径日本并效法大陆法派,进行法律制度变革之重要凭借,而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士、英美法派以及“反沈派”的兴起则动摇了日本模式的大陆法派根基,这表明了英美法派与大陆法派彼此地位的升降变化,以及中国文化价值借势回归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与文化态势。^⑮李欣荣探讨了晚清笞杖改罚金较难实施、分配大起纠纷等系列难题,特别是在上海租界,笞杖改罚金使用刑罚威慑力大减,引发了租界治安恶化,从而导致公堂、工部局、领事团和华人舆论群起质疑的困境。^⑯

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外关系史研究相对较弱,尚未做到真正的深耕细作。晚清史研究水平的整体进步对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了更高期待,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泛的视野。郑彬彬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英国议会文书等资料,指出近代英国外交部驻远东各使领馆的翻译官不是单纯的技术性翻译人才,而是搜集远东情报、研究远东情势、生产远东知识的情报官员,这些情报人员推动着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完善,也让外交部构建

远东情报网络成为可能。^⑰吕颖、王浩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资料还原了汉口法租界的建立和扩张史,再现了中法双方在不同时期的博弈过程,探讨了中国政府、法租界、汉口民众和其他列强在历次事件中的表现。^⑱郭海燕梳理了1882年朝鲜“军工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学习时间、课程内容、学习成绩、回国原因及经费,兼及军工留学之特点、中朝两国合作之经纬及留学生回国后的情况等问题,并论及此举在朝鲜近代化和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作用与意义。^⑲崔志海通过考察美国驻华使馆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中文资料,认为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均为实情,而非美方圣公会和美国政府所称之缺乏证据,指出对于中美基督教人士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应予肯定,但对美国教会和政府维护教会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干涉中国司法权的行为不应盲目肯定,否则易滋生错误史观。^⑳王笛论述了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及美国对中国收回山东主权诉求的态度,指出美国是当时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唯一大国,但其并不能主宰巴黎和会的一切决定,还必须依靠英、法两国,而对于山东问题,英、法则站在日本一边。认为巴黎和会美国对日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让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因此不能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完全失败的。^㉑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相结合,是近年来呈现出的新的研究趋向,且成为学界可以继续拓展的新领域。郑丽颖利用俄藏档案资料,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地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古活动,指出其所获取的集品数量众多,涵盖面广,且涉及的语言丰富,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㉒孙琦利用廓尔喀语原始档案和其他语种史料考察了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出发前的准备、使团委派与构成、使团在拉萨和北京的活动、使团回国与意外事件以及经济开支等方面的情况,指出此次表贡使团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㉓姚勇梳理了中缅

边境的过耕问题,指出过耕源自清末分界,中英之间曾订立约章试图对过耕关系进行保护与管理,但过耕纠纷最难判结。并认为过耕案件提供了观察国界的出现如何影响边境社会、边民如何适应并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地方性视角。^③吕昭义、柳树根据梭里村护照原件及相关的中外文档,指出宣统二年程凤翔遵照赵尔丰的指示率部入驻察隅,发放“梭里村护照原件”,一方面使边地、边民管理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④

以往从中国视角认识他国形象方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学界进一步延伸至从他者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政治文化,这样的研究思路有利于更全面完整地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刘彦利用俄文资料指出俄罗斯两个多世纪持续将中国称为“天下”是东西文明交融与碰撞的产物,认为帝俄在谋求领土扩张和寻求独特文明的历程中,共享了西方基于贸易利益和西方文明观而创造的野蛮傲慢的“天朝”形象,但并未全盘接受西方将华夷观作为“天朝”精神内核的时代叙事,而是借助彼时俄国汉学成果构建出贴近中华文明的“天下”形象。^⑤卢华考察了辛亥革命后美国威尔逊政府对革命党人从“麻烦制造者”到远东秩序的“威胁”的认识过程,以及怀疑和遏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策略,并分析了这种策略产生的原因及对孙中山向苏俄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的影响。^⑥

综上,学界在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国家建立、中外条约和租界问题、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对许多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而且还通过新材料探讨了许多新议题,加深了学界对中国近代政治、法律和军事等领域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许多政治问题与今天的地缘政治关系密切,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历史渊源方面的解释。

二、社会史研究更为开阔

社会史的研究中探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历史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议题,近年来一直被重点关注。查问近代环境病史,诊断现实生态危机,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王利华指出人与自然关系演

变是近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变迁既具有内生的动力,又源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碰撞和嵌入,因此环境史研究不是单纯考察自然,还要重新认识社会。同时,他强调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采取全球历史视野探索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生态关联。^⑦梅雪芹提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即以生态学为基本理论,以生态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为核心和主线,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生成和变迁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下的运动。认为基于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建立起来的环境史范式,可对原有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起到补充、丰富乃至高度整合的作用,并能进一步拓展对近代历史的认知。^⑧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晚清的人地关系、近代灾荒与社会变局、近代淮地环境灾难与生态修复、黄河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晚清黄河水患等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阐释。

近年新冠疫情肆虐,学界更加关注历史上疫情的发生、演变和政府应对等情况,寄希望于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由此催生了医疗社会史研究在以往基础上的持续活力。罗婧利用《上海道契》《行名录》和医院年报,梳理了开埠初期从事现代医学的医生在沪的租地、设立的医疗机构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复原了近代上海西医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过程。^⑨余新忠从生命史学和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呈现了名医丁国瑞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同时指出应历史地和更具包容性地理解“汇通”概念、立足中医疗效来寻求中医理论的根本性突破、时刻注意把握中医的本质属性并充分理解其科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⑩单丽分析了清代霍乱的发生与温度、旱涝等自然因素,以及不洁的饮食习惯、脏乱的生活环境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关系,指出深水杂源的多元霍乱流行要素应被充分考量。^⑪李林从文化史和概念史的视角阐述了教员肺癆概念的生成背景及其归因意涵,探讨了其中折射的医疗、教育及社会问题。^⑫王沛珊通过聚焦于近代中国肺结核病名的演变过程,

探究了近代医学知识的转型及医学知识形成与普及过程中的多元汇通和知识本身的复杂多样性。^③

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性别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近代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倡导“保国保种”,并将目光投射至身体和人种的改良,对西方围绕身体和性的近代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力指出中国士大夫在整理考察晚清时期从欧美转道日本再翻译至中国的性科学书籍时,发挥主体性,对西方知识进行取舍、转化和吸收了肯定女性性欲的科学论述,摒弃了“良妇无性欲”的传统观念,并从多个角度吸收和接纳了肯定女性性欲的科学观念与立场。^④袁宙飞、李璐佳指出,清末民初女性作为从“旧礼俗”向“新礼俗”转型的特殊人群,在近代报刊媒介宣传的女性解放、女学兴办等影响下,成为改良年画的主要题材内容之一。借助改良年画中女性图像的呈现,可以更好地理解清末民初女性社会角色和生活场域的变迁历程,以及此过程与整个社会礼俗秩序变迁的互动关系。^⑤

人物群体的考察能折射出各个阶层在政治大变动局势下的适应和调适过程,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近代历史进程。茅海建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云贵同乡京官录》叙述了清末官场办理节敬的一般规则和所送银两标准,并将陈夔龙所送炭敬的份数、金额与张之洞所送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清末京官送货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化,探讨清朝的命运和节敬的退场。^⑥薛勤、康文林指出,自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官制改革使官员人事嬗递与群体构成发生整体性重大变化,但《缙绅录》的记载却显示出进士和举人的吏部任职和仕途变化与官制改革前相比变化较少,这一方面体现清代官员群体构成和官员迁转秩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凸显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使清廷走出传统的制度困境。^⑦杜佩红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县官群体的人事变动,指出辛亥革命期间州县官普遍受到冲击,很多州县官弃职逃亡,旧有的州县官流动模式被打破,新的官员选用制度仍未建立起来,部分地区的县官选人陷入混乱,以

致地方官流品不全;政局稳定后,大量有科举功名或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本地精英和在籍官员被委任为县知事。^⑧

刘晨指出,太平天国时期的民变中知识分子通常拥有关键性地位,农民虽构成参与主体,也是民变的基础身份,但不宜夸大其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很难构建土地因素、人地矛盾与农民参加反抗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们通常是迫于环境和生存压力以及接受外界利益诱导,才广泛参与抗争。^⑩吕品品指出,1858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至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期间,在日中国人一直以“无条约国民”身份生活在日本,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利,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⑪顾建娣采取群体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台籍士子在割台后两年呈现的选择与去向上的复杂面向,指出这一时期台籍士子的选择和去向抉择意味着他们对自身身份的选择和认同,也是其价值观的主要体现,另外,作者还认为今日岛内的各种主张和论调追根溯源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影子。^⑫

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已被众多学者关注和引介,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具有启发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谢彦丽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从跨国史的角度考察了学界较少关注的铁路引介事件,还原了史蒂芬孙来华期间的活动、回英后的游说以及他和代理人为推广铁路计划所做的努力,探讨了史蒂芬孙引介铁路进入中国的活动与19世纪铁路的全球传播之间的联系。^⑬许翔云揭示了在“文明”话语掩盖下美国媒体报道的多元面相: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对日本野蛮行为的谴责、对日本威胁的忌惮等,展现了日本胜利给美国造成的潜在威胁。^⑭

区域史和城市史是以区域和城市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有利于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刘莉指出近代东北交

通体系的开拓与发展,改变了近代东北社会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这是日俄等列强为满足自身侵略需要的产物,完全没有对东北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关怀,对东北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具破坏性且无法修复的影响。^⑤顾哲铭考察了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门牌号从华洋二元门牌号体系转变为明确、规律、有序的“距离型体系”,实现法租界和华界门牌号体系对接的改革历程。^⑥王明东、肖建乐探析了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变动轨迹、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变动与城市治理的关系等问题。^⑦

以食品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成果。郭子健梳理了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演进的历史,揭示了战争、市场及政商网络对商业品牌的形塑,指出茅台酒的历史也为近代经济活动中特定市场客体的演化逻辑提供了某种解释。^⑧代自鹏比较了宣威火腿与金华火腿之间历史渊源、文化底蕴、生产、运输、销售及消费等方面的不同,进而探析了云南和浙江两地在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异同。^⑨

总之,以上在环境史、医疗史、性别史、区域史、城市史、食品史、社会群体等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出学界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近代历史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尽可能地呈现近代历史鲜活生动的整体面貌的努力。

三、经济史研究多点开花

民国时期,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已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在“五朵金花”中即占有重要地位。在现阶段,经济史研究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2022年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和思路大为拓展,展现出多点开花的特点。

近代财政史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热衷讨论的领域。廖文辉考察了咸同之际新疆的协饷问题,指出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东南财赋之区陷入战乱,新疆地区遭遇协饷欠解所致的财政困局,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各项开源节流的措施,但收效甚微。造

成新疆财政困局的固然有行政基础薄弱、开源潜力有限等客观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清廷在新疆地区实行军府制下的多元管理模式,而新疆的协饷危机最终又酿成严重的边疆危机。^⑩王静雅利用晚清档案、日记、信函等资料指出,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还对日赔款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由海关总税务司代征七处厘金抵偿部分借款的方案。为弥补厘金抵债省份损失,清廷又推出拨补方案,却造成拨补虚悬的窘境。抵债省份和承协省份再三呼吁改变拨款无着的困局,但因调度难度大,随后又新增庚子赔款等压力,户部对拨补方案仅做微调,相关省份只能自行应对困局。清廷固执于“内重外轻”,导致政府调度能力低下、央地矛盾升级、内外失信是财政纾困失败的关键因素。^⑪

熊昌锟指出,“五口通商”后,清廷关税中新式货币银元与关平银的折算成为中外争论的焦点,新旧洋银纳税时的补水方案以及官银号的砝码校准在各地屡起波折,而户部要求征解京饷需用足色库平银也引起了地方税司和外商的不满,这些纠纷或交涉表明英、美等国要打破传统中国的关税征收体制,建立一套新制度的意图。^⑫马维熙指出中外在庚子赔款中还金还是还银问题上的龃龉系约本文义自相矛盾所致,其背后牵涉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都从有利于己的角度予以争辩,清廷部院枢臣、督抚疆吏与驻外使臣纷纷卷入,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国人的勇气和谋略仍值得铭记。^⑬

还有学者关注到民国财政预算问题,如徐鹤涛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情况,指出此时期的预算很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却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的手段。^⑭王梅认为北洋时期历届议会都曾积极督促政府交议预算案,但都困难重重,不过这种困境促使议会一方面完善相关法规,另一方面尝试调整权限,改善与政府的关系,最终促成议决通过了“民八预算案”。^⑮

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近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

学界的新热点。翟建指出,上海开埠后城市人口增加,饮食呈现出需求量大、多样化的特征,本地农业及农产品出现各类蔬果种植扩大、养殖业迅速发展以及食品加工业兴起等一系列变化,呈现出区域经营分化、高端市场供给兴起等特征。^⑤李佳佳梳理了轧花机的发展和对中国对西方先进轧花机的引进、改良和应用等问题,揭示了中国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路径及应对特点。^⑥

学界在林业、渔业、医药等领域均有成果问世。叶磊利用鸭绿江采木公司档案、日本林业调查报告等史料,追溯和还原了鸭绿江流域的木材公司在生产流程、劳动组织与资本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特征,考察了其围绕木材生产领域所推行的各项业务的落地过程、运作逻辑与经营效果,揭示了其经营活动的性质及影响。^⑦苏颂指出,1899年台湾银行成立后便不断向华南地区扩张势力,直到1911年台湾出现严重的糖业过剩危机,才借助台糖外销中国大陆之机成立上海分行。上海分行的成立,深受近代日本对国策银行“分业主义”指导方针,以及日本在东亚“北进南守”扩张政策等多重影响,成为日据殖民地的台湾银行向大陆金融侵略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⑧胡哲指出,清末呼伦湖水系因沙俄哥萨克人越界捕鱼而产生侵渔事件,不仅损害了当地游牧民族的利益,还损害了中国的渔权,侵害了中国主权。以黑龙江将军衙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介入进来,有效提升了“俾免利权外溢”的政治意义,契合了政府在边疆推行“兴举渔业”等新政的实施。^⑨刘秋根、刘新龙运用药商文献探究了晚近时期山西药号驻广分号即旅粤山西药号的业务类型、资金来源、运输活动等问题。^⑩朱英、钟元泽论述了旅汉粤商在晚清汉口茶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对汉口城市近代转型的影响。^⑪郝平、李善靖指出,辛亥革命后山西蔚长厚上海分号面临业务总量下降、利润锐减的经营困境,遂采取信汇、电汇等经营手段积极承揽业务,并在总号指示下逐步归并债务,在亏损状态下勉力维系实现平稳收撤。^⑫

商业和企业史研究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费驰、孟二壮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档案及商业会议所发行的部分日文刊物为中心,探讨了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中国经济调查的情况,揭示了这些经济团体及调查活动在日本制定、推行对话政策中的“隐秘”作用。^⑬张忠民从整体上对前近代合伙企业的资本、产权与债权、资本合伙与收益合伙、企业产权的变动与转让、合伙企业的责任以及是否具有法人地位诸方面进行了总括性、理论性的论述。^⑭

综上可知,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多样性相同,近代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被学者发现和重视。学界在中国近代的农业、林业、商业、财政、税收、企业运营等领域均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并且触及了很多学界以往较少涉及的问题,彰显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学界探讨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更趋多样

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既包括上层社会精英的思想发展和变迁,也涵盖下层民众的思想意识。近年来学界不仅继续关注上层社会精英的思想文化历程和变迁,亦不断“眼光向下”,追溯和反映下层民众的思想、文化和认识,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中国近代上层阶级的社会思想更能反映社会整体的思想面貌,2022年学界从多个角度予以了关注。罗检秋认为,同光朝廷对于重建庙堂儒学和经学态度消极迷茫,而理学廷臣恪守程朱教条,无所作为,与地方理学家因时变通、经世致用的取向反差鲜明,这一内弱外强的文治格局一直未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扭转,最终加剧了清朝的崩溃之势。^⑮人物的思想史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永恒主题。郭卫东指出,后人对梁启超关于洋务运动只是器物层面变动的时期、戊戌维新是制度层面变动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以降是文化层面变动的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演进“三段式”的表述,在理解上略显机械和绝对。认为形而下的物质器物与形而上的制度文化互为依存,难以割舍,中国社会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急剧而又同步的嬗变。^⑯观念史研究是学

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不断产生颇具分量的学术成果。黄兴涛、黄娟指出清末传统的“国语”概念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开始成为用来指称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认为其不仅为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清廷长期推行官话与汉语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实际作用不断加大的结果,对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及相关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⑥

国人对他国形象的认识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通过对他者形象认识的变化,可以透视国人在中西文化互动中自身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韦巍考察了希腊文明形象在中国的建构过程,指出古希腊文明形象建构于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是西方文明观念输入的重要一环,且《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草创的叙述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认为古希腊传统不仅是近代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的源头,亦是反观自身文明的重要“他者”。^⑦顾少华细究了中国先进分子将“华盛顿建国”与中国“汤武革命”对接,试图开辟一条政治革新和国家富强之路,到革命派塑造出“国民华盛顿”形象,以伸张民权思想的华盛顿形象的转变,探究了清末革命话语建构过程及其历史内涵,进而省思了清末革命的历史局限。^⑧袁鸿宇、秦方考察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对意大利建国史书写的基本特征,勾勒了1860年至1949年近百年间“三杰”形象塑造的演变历程,探究了各个社会群体对异国知识接受的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心态。^⑨余露指出,清季国人的“世界史”概念主要来自日本,既强调包括世界全体,注重彼此联系,又取决于文明名义下的国家实力,呈现出理念与现实的张力。关于世界史的讨论既关乎“历史”,更牵连“世界”。中国能否进入世界,中国史是否有资格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是中西文明力较量的典型表现,关系到近代中国的立国根本。^⑩谭丹论述了近世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内涵演变,解释了新知发生与传播的路径。^⑪崔华杰指出,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

方视角的研究特点,而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了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与变迁。^⑫庄新通过梳理辛亥革命期间英文报刊涉华报道中对孙中山活动的报道,分析了不同的英文报刊基于具体的观察视角、文化身份及政治利益,对孙中山的报道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和话语策略。^⑬

学者关注阅读史,即已意识到文本的内涵与读者接受之间存在不同,他们不满足于文本描述的史实,更在意读者认识、理解和接受文本的过程,进而触摸近代文化面貌的层叠和演进;与此同时,对于文本的认识也能得以深化。蒋建国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对晚清的日记材料做了系统研究,展现了士人群体对西学文本的阐释、品味与想象,呈现出新奇、疑虑和矛盾的复合性思维,论述了士人通过阅读西书更新“知识仓库”,审视自我,反思社会,在“中学”之外形成了另类的西学文化景观,指出西学阅读从上海等口岸城市向江浙、两湖、京津等地不断蔓延,由都市进入城乡,体现西学传播与士人阅读之间的互动互进关系以及中西古今之间的纠缠过程,揭示士人的阅读和实践蕴含着内在的变革动力,促进了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⑭王美英以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为依据探究了其阅读内容和重点的变化及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转变。^⑮从学者的阅读史研究可见,各类研究已呈现出一幅立体画面,只有从多种角度、多个因素的互动中探究历史,才能构成整体的近代历史画卷。

记忆史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史学理论,探讨的是记忆如何构建历史事实,其构建的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更在意的是哪些历史事件进入人们的记忆当中,以及所记忆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出入。记忆史与宏大叙事和上层阶级叙事不同,它通常能凸显社会下层或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想象。贾琳指出,清季士人的“明遗民”记忆不仅作为一种

能动性力量参与到当时政治改革讨论中,还对清末民初的国族认同结构及其生成路径产生持续影响。他通过考察“尚武”“爱国”等“明遗民”记忆的共相与殊相,揭示了清季士人对这些记忆不同程度的政治赋义,由此产生不同政治观点的角力竞争,指出“明遗民”记忆在后来的团结国民、抵御外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⑩

学术思想史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逐渐成为显学,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杨天宏考察了“桐城义法”与桐城派的近代命运,认为桐城文章作为古文典范,其指归充分体现在桐城义法中,该种义法为年轻学子习作古文铺就入门及进阶之道,并为中国历代古文价值的再发现提供基于传统话语的认识工具。今日评价桐城派,既要认识到其时代局限及桐城之学的不成熟,又要肯定新文化人以白话取代古文对推进教育与文化普及的积极作用。民国肇建后桐城派在新旧之争中惨败,新文化带来的学术文章“典范”兴替固然是主要原因,桐城派在社会学意义上居于劣势也是致败因素,尽管如此,“桐城义法”对于今日学人仍可提供以古典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的方法论启示。^⑪吴仰湘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及相关原始材料,探查了《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的始末详情,指出安维峻自称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实属事后有意夸饰;广东当局奉旨办理此案,在李滋然提议“免于销毁”后又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几乎办成文字狱;两广总督李瀚章最终以“谕令自行销毁”覆奏结案,实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能将此案的化解归功于一人。^⑫向鸿波论述了罗家伦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但其“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最终也未能成书,由此可以展现其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功绩。^⑬虞和平指出,章开沅在资产阶级研究中起了明显的创导作用,提出和实践了

开展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研究、开辟商人群体研究、倡导群体互动研究等三个新的研究理念,肯定了其与时俱进、领先一步的学术创新风范,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推进和引领作用。^⑭

综上所述,受新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出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通过搜集各类报刊等中外资料在中国的域外观、记忆史、阅读史、概念史、学术史等领域都有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些成果极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使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五、人物研究不断拓展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存在“重事轻人”的研究趋势,由此导致历史研究中“人”的消失。然而,本年产生了不少有关人物研究的精彩之作,从多维度深化了近代历史研究。孙锋、关晓红指出晚清粤人黎兆棠被任命为船政大臣后,通过调整旧制、开源节流、转变师法对象、续派生徒出洋等举措,意图提升自建兵船的性能与水平以配合整体海防规划,不过却因多重障碍迫使造船迁缓,最终招致物议而去职。黎兆棠改造新船遭遇的各种困扰,不仅反映静态章程与实践操作的差距,以及各方对船政事业的不同态度,更突显出国人围绕洋务自强面临的诸多限制与困境。^⑮

孙毓斐认为孙中山与桂系关系变化是第一次护法运动中失败的重要原因,指出孙中山在盐税、铁路收入和司法经费等三个方面的财政收入取得一定进展,有效支持了军政府的政权运作,然而随着护法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无力再提供经费,于是在各方现实利益交织纠葛下,桂系逐渐分化、瓦解了孙中山的护法同盟,最终迫使军政府改组,孙中山的第一次政权建设尝试宣告失败。^⑯彭玉平厘清了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的真相,指出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谣言成为“公论”。并检视了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交往,认为二人经济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对王国维一家通过各种方式多有支持,主要目的是让

其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⑤崔岷、吕书额探讨了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在北京陷落后勉力履职的同时,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扞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⑥戴海斌通过搜辑零散残破的“记忆”碎片,讨论了庚子事变中三个“小人物”形象的基本轮廓,还原了他们作为“信使”的古史,进而观察了他们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体,如何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以及在不同类型史料文本中,各自的位置与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⑦谢静珍利用一手法文资料指出,作为“小人物”的丁敦龄在19世纪中叶直接参与汉语与中国文化在法国传播,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独特贡献。^⑧此外,学界还对翁同龢、锡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严复、丁文江、蔡锷等近代人物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

从上可知,学界仍持续关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近代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大人物”的同时,对在近代历史中发挥过作用的“小人物”亦有研究,整体呈现出更加深入和拓展的研究态势。这些研究既有利于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又有利于拓展研究的维度,让学界更为全方位地理解近代的历史发展和变迁。

六、“三大体系”建设探讨更受关注

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总体思考和殷切期盼。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各有侧重,彼此呼应,相辅相成,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方向,共同构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同样是该年度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崔志海认为,在中国近代史诸多研究范式 and 历史叙事体系中,革命史叙事体系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比较适用,这两种体系不存在要不要运用的问题,只是如何看待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它们与其他叙事体系或研究范式存在互补、不相冲突,也绝非

其他研究范式所能取代或解构的。对于晚清革命和民族主义两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教条化、简单化,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主观地抬高或贬低。^⑨王先明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要在纵向贯通中辨其趋向,即社会史历经百年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不同的问题聚焦,其学术探究重点也各有不同;并且在取代旧史学的进程中,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断建构和嬗替中已然自成系统。新时代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理当在纵向贯通中汲取精要,创新学术,把握时代需求和学术态势,引领学科未来走向;同时在横向贯通中定其方位。社会史,无论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通史主体内容,还是作为通史之一的专史,都必须在与文化史、政治史(或革命史)以及经济史的横向贯通中加以比较分辨,厘定其学科方位,落定其体系构建。^⑩郑大华强调,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建设首先要搞清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确立真正体现中国近代思想史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历史分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观点思考问题,将西方理论方法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⑪左玉河指出,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重学科轻方法、新文化史范式存在重方法轻学科的局限和困境,主张将二者加以综合成新型文化史研究,即既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保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又将其视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注重文化分析和意义解释。这种结合既能解决传统文化史忽视方法探究而导致的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又能克服新文化史对象的漫无边际而带来的学科危机和碎片化问题。^⑫倪玉平主张,经济史领域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应注意学科体系建设宜宽不宜严,学术体系建设宜精不宜泛,话语体系建设宜实不宜虚。^⑬此外,还有马敏、欧阳哲生、金民卿、金以林、行龙等学者对三大体系建设做了各自的分析和阐释。众多学者同时聚焦于“三大体系”理论建设的研讨,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学界希望摆脱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框架的

限制,建立属于本土的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随着学界研究方向的下移,晚清民国史前期研究仍具有活力,在各个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成果,令人惊喜。如太平天国史研究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但之后逐渐陷入沉寂,不过近年也有年轻学者从新的角度予以重新阐述,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这为晚清史研究的再出发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为其他已处于近代史研究高地领域的继续研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发。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学界充分利用中外文新资料,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同样不可忽视“旧有”资料的掌握和阅读。许多学者直接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或其出版的资料汇编撰写学术论文,还有学者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撰写论文。随着学者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大量利用英文和日文等外文资料,还开始利用法文、俄文等外文资料。以新的资料为基础,学界一方面加深了对原有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方向,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也出现了专注于查阅新资料、忽视原有旧资料的现象。众所周知,只有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方能理解近代史的大势和趋向,也才能将新资料安放于合适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是交叉学科研究成果辈出,同时也对研究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科交叉是引领学术创新的生长点,而真正的学术进步,均是在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通中获得启发,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学科交叉首先是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历史学不断借鉴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的研究成果更具分析力和解释力。其次,学者发表的论文已很难简单划分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某

一领域的论文,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出现属于政治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文。这说明学者在探究历史现象时,已有意识地注意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从整体上理解和认识史实的发生和演变情况。

三是关注本土理论和话语建设,合理吸纳中外优秀的研究视角和成果。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曾先后出现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反应”范式、“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市民社会理论,每一种范式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段,不可否认其在近代史研究中发挥过相应的作用,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催生了诸如阅读史、记忆史、性别史、情感史等专题的研究,但诸如根植于西方的“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表现出“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形不符,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为此,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迫切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三大体系建设笔谈的组织还是环境史范式的提出,以及学者对医疗社会史理论的完善等,都反映了学界希望构建更适应本国实际的学术研究理论。

四是历史研究在细节考辨、理论创新的同时,更需要有大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新视角通常是长期研究积累的激活,新思路也往往是学术线索的缀连想象,均需大量功夫的积累。而新文化史的传入,视“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将一切社会现象作为“文本”加以探究,使近代史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概念史、图像史、阅读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记忆史等,这些新的议题使普通大众乃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纳入研究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以及回应近代挑战的方式,从而使近代史研究更为动态鲜活。外国理论和方法固然促进了新视野的拓展、新材料的发现、新领域的发掘,加深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对史料的解析

与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研究的根基,新的议题如没有聚焦于重大问题,缺乏整体和宏观的考量,必然导致研究越来越微观和细碎,从而导致碎片化严重。历史研究终究还是要有大的人文关照和价值追求,不能失去对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把握,要努力避免碎片化的研究,故宏大叙事的价值不应被消解湮灭。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也应突破时代和领域的束缚,打通古今中外,做贯通式和整体式的研究。事实上,学界也一直致力于反对碎片化,力图克服学术研究碎片化困境,提出解决碎片化的突围之路。可喜的是,学界开始从整体研究和长时段研究关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如有的学者解读国家转型视角不再限于晚清本身,而是从清代前期的历史中探寻其发展脉络,且联系了清朝之后的国家演变来判断晚清社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不是从经济、社会、政治、财政、军事某一领域具体分析,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国家转型这一宏大而复杂的过程。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间段为1840—1949年,但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仅收录1840—1919年的学术论文,1919年以后的内容由《中国现代史》收录,特此说明。

注释:

①李怀印:《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文史哲》2022年第3期。

②翁有为、王力:《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徐勇:《近代中日两国军阀政治现象及其政治文化比较》,《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

④马建标:《武人、政客与列强:民初军阀政治之管窥》,《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3期。

⑤任锋、马猛猛:《“中央集权”在中国:一个现代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理论检视(1899—1911)》,《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⑥刘文华:《“旧制”与“现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

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⑦杨猛:《“问责”:宣统二年弹劾军机风潮与清廷中枢改制》,《学术研究》2022年第5期。

⑧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⑨尚小明:《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

⑩李长莉:《1914年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与黄兴分裂的反应新证——宫崎滔天家藏题字幅释读》,《河北学刊》2022年第2期。

⑪侯中军:《“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⑫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⑬张仲民:《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建构方式的争论》,《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

⑭赵建民:《国会研究所与1908年国会请愿》,《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⑮杨瑞:《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⑯李欣荣:《清季笞杖改罚金的刑制改革及其困境》,《史林》2022年第5期。

⑰郑彬彬:《英驻华使领馆翻译官培养与远东情报网构建(1842—1884)》,《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⑱吕颖、王浩:《汉口法租界的建立与扩张——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⑲郭海燕:《近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像:朝鲜首批来华“军工留学生”研究》,《安徽史学》2022年第2期。

⑳崔志海:《美国驻华使领馆档案中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㉑王笛:《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华立场:山东问题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5期。

㉒郑丽颖:《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古活动及影响——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例》,《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

㉓孙琦:《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研究》,《清史研究》2022年第3期。

㉔姚勇:《近代中缅边境的过耕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②⑦吕昭义、柳树：《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赵尔丰察隅境域“护照”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②⑧刘彦：《“天下”比邻：19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②⑨卢华：《防范与限制：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中的革命党人认识及策略(1913-1917)》，《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②⑩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②⑪梅雪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②⑫罗婧：《近代上海西医分布与城市空间扩展(1844-1879)》，《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②⑬余新忠：《以新守旧，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②⑭单丽：《深水杂源：清代霍乱流行的自然与社会要素(1820-1911)》，《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②⑮李林：《教员肺癆：一种近代“职业病症”的意涵及应对探微》，《史林》2022年第5期。

②⑯王沛珊：《从“肺结核”病名演变看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的多元汇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9期。

②⑰杨力：《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女性：中国性科学萌芽的跨语际分析》，《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

②⑱袁宙飞、李璐佳：《性别·角色·场域：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

②⑲茅海建：《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1期。

②⑳薛勤、康文林：《清季改革视阈下吏部官员群体的人事递嬗与结构变迁(1898-1911)——以〈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2期。

㉑杜佩红：《“革命”是否“革官”？辛亥革命前后的县官人事变动》，《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

㉒刘晨：《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乡村民变的人员构成及权力结构分析》，《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㉓吕晶晶：《夹缝求存：在日中国人研究(1858-1871)》，《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㉔顾建娣：《改隶之悲：乙未割台后台籍士子的选择(1895-1897)》，《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㉕谢彦丽：《英人史蒂芬孙的“中国铁路公司”：初探铁路

引进进入中国与19世纪铁路的全球传播之间的联系》，《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㉖许翔云：《美国媒体对甲午战争的多样化报道》，《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㉗刘莉：《近代交通发展与社会生态变迁——以东北地区为例》，《浙江学刊》2022年第6期。

㉘顾哲铭：《空间不平等的修复：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门牌号体系变迁研究》，《史林》2022年第5期。

㉙王明东、肖建乐：《近代昆明城市人口变动及影响探析(1840-1949)》，《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㉚郭子健：《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

㉛代自鹏：《金华火腿与宣威火腿之比较研究(1900-1949)》，《浙江学刊》2022年第6期。

㉜廖文辉：《咸同之际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与财政困局》，《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㉝王静雅：《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探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㉞熊昌锐：《晚清关税税银征解中的纠纷与调解》，《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㉟马维熙：《还金还银？庚子赔款偿付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22年第5期。

㊱徐鹤涛：《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

㊲王梅：《北洋时期议会审议国家预算的困境及其演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㊳翟建：《近代上海城市人口扩张与本地农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

㊴李佳佳：《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全球扩散与中国的协同应对——以轧花机为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㊵叶磊：《鸭绿江采木公司与日本对东北林业生产的殖民介入(1908-1931)》，《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㊶苏颂：《台糖外销与近代台湾银行向上海的金融扩张》，《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㊷胡哲：《清末呼伦贝尔渔业开发与渔权博弈》，《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㊸刘秋根、刘新龙：《晚清民国时期旅粤山西药号经营研

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

⑫朱英、钟元泽:《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江汉论坛》2022年第11期。

⑬郝平、李善靖:《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维系与收撤——以蔚长厚上海分号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⑭费驰、孟二壮:《近代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中国经济调查研究》,《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

⑮张忠民:《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⑯罗检秋:《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及其后果》,《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

⑰郭卫东:《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三段式”表述的再思考》,《历史档案》2022年第4期。

⑱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建构》,《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

⑲韦巍:《道咸时期西洋史地论述中的“希腊”文明形象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⑳顾少华:《“华盛顿形象”与清末革命话语的建构》,《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㉑袁鸿宇、秦方:《“意大利建国三杰”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及演变》,《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

㉒余露:《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与文明力较量》,《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

㉓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

㉔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㉕庄新:《辛亥革命期间英文报刊涉华报道中的孙中山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2期。

㉖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㉗王美英:《孙宝瑄的阅读实践与思想转变》,《中国经济

与社会史评论》第1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㉘贾琳:《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效应》,《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

㉙杨天宏:《典范兴替:“桐城义法”与桐城派的近代命运》,《南国学术》2022年第2期。

㉚吴仰湘:《〈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㉛向鸿波:《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以史料搜集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㉜虞和平:《章开沅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推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㉝孙锋、关晓红:《粤人黎兆棠与晚清海防船政》,《学术研究》2022年第9期。

㉞孙毓斐:《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财权博弈为中心》,《民国档案》2022年第1期。

㉟彭玉平:《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㊱崔岷、吕书额:《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

㊲戴海斌:《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

㊳谢静珍:《丁敦龄:一个“小人物”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㊴崔志海:《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㊵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㊶郑大华:《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㊷左玉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㊸倪玉平:《“三大体系”建设与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